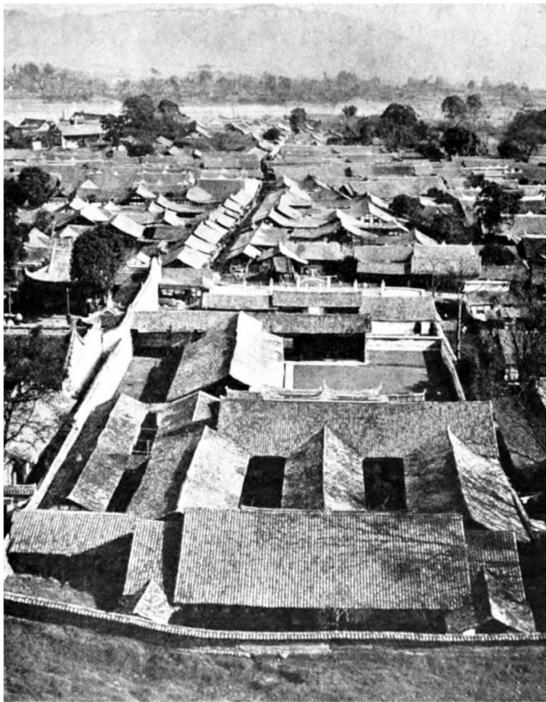


钩沉

鄞县人俞充： 威震边陲的宋代能臣

祝永良



百年前的雅安古城。选自《民国期刊》



雅州府图，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绘，藏四川大学图书馆（祝永良 供图）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有个古朴的角落叫南门坎。这里古木参天，环境清幽，行人不时从磨得锃亮的青石板路上经过。这条青石板路和一旁的石墙，是雅安古城的唯一遗存，它与苍坪山连为一体，见证着雅安城千年的变迁。

雅安，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盆地西缘，东邻成都、西连甘孜、南界凉山、北接阿坝，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近代，更是留下了“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的传奇诗篇。而雅安作为一座古城，揭开它历史篇章的，是一个叫俞充的鄞县人。

距今900多年前的宋代，那时的雅安叫雅州。

初入仕途

俞充，生于1033年，字公达，明州鄞县人。据《鄞西桂林俞氏宗谱》记载，宋咸平年间（998—1003），浙东制置使俞鼎，自吴兴蠡山（今湖州市德清县）迁黄古林俞家，遂为迁鄞俞氏始祖，后裔分居城内及梅墟、东吴等地。俞充为迁鄞俞氏的四始祖、鄞东俞氏的二世祖。目前，鄞东俞氏约有5000人，居住在东吴、东钱湖、横溪、五乡、塘溪、瞻岐等镇。

年少时，俞充拜“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为师。楼郁任教30年，一时英才学子均出其门下，俞充就是其中一名佼佼者。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26岁的俞充考中进士，成为鄞县最早的进士之一。他先是被任命为虞乡（今山西省永济市虞乡镇西北）县令。俞充将明州兴教重学的理念带到这个山麓小城，一时民风大为改观。意气风发的俞充，还在那里留下了众多咏赞当地名胜的诗篇。如他在王官谷游览时，想到唐末文学家司空图曾在谷中写下《二十四诗品》等传世名作，诗兴大发，在司空图命名的休休亭中写下了充满感情的《贻溪怀古十篇》，其中一首诗写道：“猛虎正横行，孤猿发长啸。名高世人间，三枉鹤书诏。借问趋朝参，天意独难料。咫尺首阳山，清光静相照。”表达他对司空图身处乱世而政治上决不妥协的钦佩之情。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曾为鄞县知县的王安石入朝任参知政事，在神宗的支持下拉开了变法图强的序幕。这一年，俞充也被召入京都，升任都水丞，这是一个主管水利的职位。在随后几年里，俞充主持了汴河清淤工程。汴河即通济渠，为隋代开掘的大运河，是北宋南北经济交流的大动脉。俞充发动百姓清淤筑堰，并将挖出的淤泥作为肥料改良农田，一举解除了河道淤塞及洪涝灾害的威胁，将汴河沿岸的8万顷农田改造成为肥沃的良田。由于治水绩效显著，俞充被任命为中书户房的检正官，加集贤校理、淮南转运副使。

筑城御蕃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俞充出任成都府路转运使，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成都地区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最高行政长官。

当时，成都路辖下的茂州（今汶川、茂县）没有城墙，仅栽种一些树木作为屏障。宋朝通过公正处理汉夷纠纷、改善夷人生活、让羌人担任守将等绥抚政策，换得西南边境相对安宁。然而，当地的蕃人武装却常常趁月黑风高之夜假扮强盗，侵入州城，掠夺牲口，打劫居民。

俞充了解这一情况后，向朝廷献上“御蕃十策”，其中之一就是建议修筑茂州、雅州城墙。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次年4月，正值茂州城墙动工之际，其下辖的羁縻州（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县）——静州守将杨文绪觉得此举是断他的财路，便联合张仁贵部发动叛乱。叛军封锁了茂州城，还控制了茂州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

宋神宗闻报，急派内侍押班王中正任成都府路体量安抚使，调集数千陕西兵士增援俞充平叛。

朝廷大军一到，叛军立即作鸟兽散，杨文绪、张仁贵等头领被生擒。同年十一月，俞充和王中正调集各路官军，征讨茂州蕃部，迅速攻破蕃部要塞鸡宗关，扫平蕃部诸多部落，经此一役，茂州蕃部全部订立盟约，归顺宋朝。同时，宋廷根据俞充的建议，决定恢复“永康军”。“永康军”恢复后，治所设于导江县，即今四川省都江堰市东南二十里的导江铺。这表明川西北作为战略重地，被重新纳入宋朝防御体系。

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之称的雅州，当时是青衣江畔的一个小要塞，基本不具备防御功能。眉山吕陶（1028—1104）的《吕陶集》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臣伏见熙宁中，朝旨下俞充按视成都路，接近蛮夷州军寨。俞充乞修筑雅州城。所计工料万数浩繁。续准密院批状，眉州永康军修筑雅州城。”这是目前史书中关于俞充筑城的唯一记载，城池的中心位置就在苍坪山麓，即今雅安市雨城区。虽然这次俞充没能大规模兴修坚固的城墙，却让雅安这座城市的雏形得以形成，雅安的建城史由此揭开。

淡泊名利

西南边陲安定后，朝廷决定对有功人员进行褒奖。俞充淡泊名利，在申报战绩时，将功劳全部让给了王中正。王中正因此非常感激，回宫后即向皇帝推荐，说俞充这个人品行好，能力强，可委以重任。皇帝下诏，让有治水经验的俞充掌管都水监，进入直史馆管事。不料，中书都检正御史彭汝砺启奏，说王中正是个宦官，俞充在向他献媚。宋代视御史为监察官员的利器，皇帝的任命只好暂时搁置。

就在这个时候，黄河发大水了，澧州（今河南濮阳西）曹村一带黄河决堤。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己丑，河决曹村，澧湖北流遂断绝，河道南徙，东汇梁山张泽泽，又分为两支，一支东南入淮，一支北流入渤海。淹县45个，坏田30万顷。

宋神宗急令俞充以权都水监的身份前去指挥抢险。同时，他还交给俞充另外一项任务：实地调查“浚川耙”的疏浚效能。

浚川耙又称浚川耙，系李公义、黄怀信两位官员所创制的疏浚工具。《宋史·河渠志二》载：“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耙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钉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车绞之，去来搅泥沙。已，又移船而浚。”

农田水利和浚治黄河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变法派为此想出了许多办法，浚川耙就是用于浚通河道的一项创新发明。

熙宁十年五月，官员范子渊上奏：在浚理黄河河道中使用浚川耙后，“水悉归故道，退出民田数千顷”。神宗大喜。然而，以文彦博为首的一些大臣却大泼冷水，加以阻挠。于是，宋神宗命俞充前往核查。

俞充通过实地调查，认定使用浚川耙疏浚河道，有效保护了堤岸安全，证明了浚川耙的功绩，使变法派在这场争论中取得胜利。

俞充回朝后，还力陈事关黄河防守的十多项要务，受到朝廷重视，使汴口河道的兵力得到恢复和加强。

筹划西征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宰相王珪探知皇帝有收复被西夏侵占的灵武之意，推荐文武双备的俞充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知庆州，兼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筹划收复失地。

庆州位于宋夏边境，那儿的士兵很是骄横，见统帅是位来自江南地区的书生，不仅纪律散漫，还多有放肆悖乱之举。为严明军纪，俞充使出雷霆手段，在军中当场斩了5个不听从命令的骄兵悍将。

而当俞充听说有军士贫病交加，就拿出自己的薪俸去接济他们；对守卫边境的将士，他前往安抚慰问；对有家人去世而无力办理丧事的守军，他拿出自己的钱接济。为此他散尽家财。由于号令严明，与军士同甘共苦，士兵们无不敬服他的威严，感念他的恩德。

环州地区的慕容家族在当时西北一带颇有影响力，与宋朝、西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年，其首领慕容恩、慕容化均归顺宋朝。后来，这个家族的首领迎通屡次纵火杀人，还聚兵为乱，攻杀旁族。俞充命大将张守约领兵弹压，擒获其党徒36人，其余300多户逃入西夏。俞充命宋军陈兵西夏边境，迫使西夏将这些人全部遣返。

西夏民族素以彪悍著称，每当边境形势紧张，宋军往往处于守势。可这一次，西夏为什么突然变软了呢？这跟西夏国内发生的一起政变有关。

原来，西夏国主李秉常十分喜好汉族文化。在与宋朝作战中，西夏俘虏了不少汉人文士，李秉常就向他们请教宋朝礼仪制度，准备在夏“复行汉礼”，废除“蕃仪”，但他的改革遭到了以梁太后为首的母党势力的强烈反对。

西夏大安七年（1081年），为削弱梁氏势力，李秉常接受大将李清的建议，打算将黄河以南之地献给宋朝，用结好的办法，借助宋朝力量打压梁氏母党。

不料消息泄露。梁太后召集幸臣吕德等密谋，诱来李清喝骂，于席间一举将他拿下，随后，将李秉常囚禁在距兴庆府官五里之地的木峁。

梁太后囚禁李秉常后，宋朝断绝了给夏的岁赐，关闭了两国和市，西夏财政困乏，物价暴涨，官民不满情绪日趋激烈。而此时的宋朝，经过王安石改革的精锐西军，已非往日那般孱弱。

俞充深知皇帝有出兵之意，也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所以一直殚精竭虑筹划西征，眼见时机成熟，急忙修书朝廷，力主伐夏。

他在奏疏中写道：西夏的国主秉常，可能已被他的母亲梁氏所杀，也可能是被关了起来。梁氏淫荡放纵，西夏人无不抱怨，这实在是我们兴师问罪的好时机啊！现在师出有名，进兵必势如破竹，希望能尽快让我入朝觐见，向皇上陈述攻打他们的策略。

皇帝接到奏疏，急诏俞充入朝。

壮志未酬

然而，天不遂人愿，在这节骨眼上，意想不到的悲剧发生了。

元丰四年（1081年）的一天，是俞充定下赴京的日子，这天清晨，随行的士兵左等右等，就是没有等来出发的命令，也不见俞充从卧室出来。起初，士兵以为统帅日夜操劳，不忍去打搅他。谁知道他竟会一睡不醒。

在宋夏大战张弓待发之际，年仅48岁、雄心勃勃、成竹在胸的俞充因积劳成疾，猝然而逝。

消息传到京师，皇帝和大臣痛惜不已。著名文学家苏轼将俞充比之于“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蜀相诸葛亮，作《俞公达待制挽词二首》，表达了深深的哀痛之情：

其一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讟西来上为惊。玉帐笑谈成昨梦，锦囊书札见平生。衣冠渐散红莲幕，铠甲还归绿柳营。可道风流回首尽，芝兰庭下聚朝荣。

其二

词场英妙气如虹，出入青云见事功。流马木牛通蜀道，萑中羽扇破戎营。风尘使者旌旄上，春在将军组甲中。诏墨未干人奄奄，伤心江汉日东东。俞充去世后，宋朝集结30万军队和20万民夫，分五路攻伐西夏，初战告捷，但因速胜心切、用人失当、将领不和、补给困难，加上西夏扒开黄河以水代兵，一度功败垂成。后期，宋军总结教训，在西夏国土上修筑城堡，逐步蚕食，以比拼国力的方式将西夏逼向了衰亡之路。如果没有后来的金国大举南下，灭夏，或许是早晚之事。

《宋史·俞充列传》评价：俞充制军禁暴，足为能臣。而且他还能审时度势，假使没有死，边境的祸事，难道还会继续吗？

家乡人民为表达对这位心系国家、人民的好官的怀念，在鄞西古林镇嘉桥建俞圣君庙（现已移至藕池村），敬仰祭祀，香火不衰。



位于海曙区古林镇藕池村的俞圣君庙（祝永良 摄）

朋友的父母中有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常听他们说起该病对家庭造成的折磨，确实苦不堪言。笔者以前也读过一些相关书籍，知道此病是由患者脑部海马体萎缩导致，不可逆，难痊愈。目前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在时下老龄化社会中，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数量越来越多。由吴彦姝、奚美娟两位演员主演的电影《妈妈！》，正是聚焦这一社会问题，创作的一部极具人文关怀的亲情作品。

故事发生在某高知家庭。母女两人，一个已至耄耋，一个年逾花甲，退休前都是大学老师，属于优雅端庄的女性知识分子。女儿冯济真渐渐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某些“异样”，比如：记错母亲需要的早餐食谱；洗好东西后，忘关水龙头；时不时出现幻听、幻视……去医院一查，凡此种种，均为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兆。

如果以后真的失忆、失智，难以控制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该怎么办？恐惧如巨大的阴霾，倾覆而下。冯济真泪眼盈盈，望向85岁的老母亲蒋玉芝：趁着自己现在病状还轻，作些准备吧。她先是将存款转到了母亲名下，又给母亲上了人身保险，抓紧整理、出版父亲留下的考古日记……阿尔兹海默症的袭来，确实猝不及防。不久她就开始大小便失禁，像个孩子似的任性胡闹，甚至把自家的门给拆了，还出现暴力倾向，咬伤母亲的手臂。相较于冯济真病态下实施的这些破坏行为，观众更心疼的是那个身材矮小、背脊微躬、一头银发的年迈妈妈。片中有一幕场景，以现实的风吹雨折，寓意了蒋玉芝看着孩子“疯癫”后无言的创痛：滂沱大雨下，女儿在庭院中迎着雨水，不管不顾，手舞足蹈。那屡屡去给女儿打伞、又屡屡被女儿推开的老人，渐渐彻底淋于雨中。她脸上，湿漉漉一片，分不清哪些是雨，哪些是泪……

冯济真正常的时候，是认识母亲的：“妈妈，我很害怕，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她这是在向母亲倾诉，自己

爱，是一帖良药

电影《妈妈！》观后
曲水



《妈妈！》电影海报

已没有办法像正常人那样保持理性思维了，这种感觉宛如窒息。对此，妈妈并未多加劝慰，只是用枯瘦的双臂牢牢抱住了女儿。这个85岁老母亲所迸发出的情感能量穿透银幕，溢入人心。冯济真没犯病时，曾焦虑地问：“妈妈，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这说明，她对母亲含有愧疚之心。当妈妈的，又怎会嫌自己的孩子“添麻烦”呢！母女之间两种激烈的情感彼此涌动，使影片于无声处，动人心魄。譬如冯济真病情加重后，退回到孩童心性。蒋玉芝给她买了冰激凌吃。她看着自己65岁的女儿一面贪婪地舔着冰激凌，一面“无情”地下结论：“你不是我妈妈！”转而又跌岩地加了句：“但你和我和妈妈一样好！”这时，吴彦姝的微妙表情精准地诠释出人物内心不知是喜是忧的深沉矛盾。蒋玉芝是个妈妈，却非圣人，她也有性格和脾气，所以偶尔也会冲着女儿辩驳：“哦，我当了65年的妈妈，现在我就不是你妈妈了。”

也许是因为电影围绕的话题太过沉重，导演便有意将一些患者所具的真实病状作弱化处理。影片中没有出现妈妈倚着背去收拾女儿搞出来的满地狼藉，我们看到的是母女俩共同生活在一个草木扶疏的带庭院的居所中。花枝、绿叶以及从枝杈间漏下来的缕缕阳光起到了滤镜作用，以一种自然界存在的美感之力稀释掉人物内心积累的悲伤。影片还关注了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尊严问题。根据冯济真的症状，病理学上可以判断为“中期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她游走于清醒和迷失之间，常会做出诸如“在超市拿了东西，不付钱就往外走”的不规矩行为。但导演为了维护其尊严，没有安排“被群众当成小偷后扭送派出所”的情节。现实中的病人状况也许会比电影里糟糕得多。电影毕竟是艺术，散发着创作者的浓郁人情。在《妈妈！》中，观众不难看到孟子所说的那颗“不忍之心”。

影片开端部分出现的红发女孩貌似与故事主体无甚关联，可她在片末又出现了。这次她不再是在公交车上偷窃裁缝的不良少女，而是成人的大学学生。她也有了孩子，也做了妈妈！她出于对冯济真昔年救助的感恩，前来看望。不少观众觉得这个角色纯属赘余，我倒认为她是影片中一抹由暗淡转光亮的色彩，代表了妈妈的爱已在年轻一代身上延续……

该片在关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生存境况之外，传递出积极情感的惊人力量。当人类陷入某种极端无助的困境时，除了有深厚的母爱守护，有改邪归正后红发女孩的细心照料，还有朱时茂饰演的医生认真严谨的答疑解惑，这些人类美好情感的交相辉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良药，那就是爱的力量，善的力量，人性的力量！

